

中西传统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

——基于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分析

钟祥财

对中西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立以来一直受到关注，已发表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从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角度拓展这一研究，可以有新的发现。

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是西方学者在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时遵循或运用的两种基本方法，它以不同的人性假设为内在前提（即个人为增进自己福利而努力的行为动机是否可以改变），由此推导出分析、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不同思路、理论派别和政策建议。具体而言，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有如下三个含义：（1）人们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个人的行为；（2）整体的行为是由单个或几个个人的行为所构成的，因此，“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此行为影响的多人对于这一行为所赋予的意义”；（3）个人行为是认识整个集体的分析起点。^①与此相反，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则认为：（1）就其本质而言，社会整体的意义超过其组成部分的加总；（2）社会整体中的部分或个体，其行为和功能受到整体的显著影响；（3）因此，社会系统的制度和个人在整体中的地位是理解个人行为的起点。^②

作为专业术语，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在欧美学界最早出现于18世纪，到19世纪后期逐渐清晰，而中国学者运用这种分析工具反思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则是在“五四”运动前后。1916年，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写道：“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他认为，西方文化中对个人价值的尊崇，是和经济制度上对个人财产的保护相互支撑的，由此构筑了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风貌的坚实基础。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常纲立教”，既没有个人人格的地位，也没有保护个人财产的制度安排，这是需要深刻反省的。^③1920年，李大钊在分析中西经济思想差异的原因时指出，经济思想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有其客观的历史规定性的，这种规定性也就是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形成的内在原因。他把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划分为东洋和西洋两类，其中东洋又称为“南道”，即温带气候区域，西洋又称“北道”，即冷带气候区域，在李大钊看来，温带气候适合于定居的农耕文明，因此“家族繁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而冷带气候没有条件从事这样的农业生产，只能转而从事流动性很强的工商业经济，“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主义——个人主义”，又由于农业文明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工商业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更具有竞争性，李大钊还把东洋文明称为“静”的文明，西洋文明则是“动”的文明。^④到20世纪30年代，马寅初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与外界没有经济交往，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学者思考经济问题往往集中在农业方面，“而国家之政策，亦以农本主义为对象。其思想，其政策，无一不有全体主义之色彩”，“政府不但干涉私人之事业，其直接有关于国家经济之事业，且由政府经营之”。^⑤唐庆

① Ludwig Von Mises:《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上册，夏道平译，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第48页。

② 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34页。

③ 《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2—83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178页。

⑤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9页。

增指出,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组织状况,使“个人主义,向无充分之发展”,他强调,中国要产生完善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对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结构进行变革,并且着力弘扬和培育重视个人发展的价值观和教育事业。^①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并不缺乏主张自由竞争的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思想表达。《老子》说,最好的治理状态是民众不感觉到有一个统治者,等而下之的才是受到人民称颂的统治者,至于被民众畏惧和非议的,则是最坏的统治者,它主张无为而治,断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强调通过“无为”可以达到“无不为”“无不治”。^②孔子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列为执政者的美德之一。^③慎到认为“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就是顺应人的本性,让人民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强迫人民都要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是会失去人心的,“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④《管子》(战国时期作品)认为:一个理智的统治者应该因势利导,“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在“无形无声”中使“民自富”。^⑤司马迁把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分为优劣五等:最好的做法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善者因之”,然后依次为利益诱导、观念驯化、行政管控,最不好是“与民争利”。^⑥由此可见,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存在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这说明从这个角度对中西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是可能的。如果说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主要是在现代经济学演进过程中得以形成和深化的,那么在此之前中国古人的相关见解,我们不妨称之为经济思想的方法论。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方法论的形成和演进具有哪些特点?其启迪意义何在?

首先,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方法论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由两个时间段构成,第一个时间段是先秦,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学派众多和争论繁荣的时期,根植于农业社会的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这一阶段有初始的表述。就前者而言,《商君书》是一个典型。在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他大力主张农战,制定和实行抑商政策,依靠的是国家的力量,运用的工具是严峻的法令。何以至此?或者说极端的行政干预为什么必要?《商君书》做了系统的论述。首先,在《商君书》中,整体(国家)和个人(民众)处在互相对立、有你没我,非此即彼的矛盾状态,整体的强大非但不是以个人的发展为必要条件 and 最终目标,而且必须以个人的不发展为前提。在《商君书》里,诸如“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⑦之类的说法多次出现。商鞅所说的弱民,是指让人民在经济上依赖国家,在心理上惧怕国家的法令,而“以强去强者,弱”^⑧,则是指如果让人民变得有能力了,消除社会上违法现象的目标即使得以实现,国家的统治力也必然被削弱,这是不可取的。《商君书》鼓吹,政府不能对人民太慈善,统治者要始终把国家当作贫穷之邦来治理。这样的政治理念,与先秦时期的道家 and 儒家明显不同。问题恰恰在于,以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为引领的商鞅变法使秦国的模式在当时成为压倒其他样式的强盛之道。

第二个时间段是秦汉,随着封建国家的建立,经济思想逐渐趋于统一,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取得了主导性地位,法家的经济理念和政策体制与儒家“大同理想”相结合,形成了重农抑商、政府干预为特点的主流观念和体制格局。通过对《商君书》和《管子》轻重理论等文献的深入分析,可以梳理出国家本位的经济发展思路如何从战国时的秦国扩展为整个汉朝的决策共识的过程,从而揭示出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从农业生产延伸到商业流通领域的理论脉络。而在这一学派思想的融合过程中,董仲舒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4页。

② 《老子》。

③ 《论语·尧曰》。

④ 《慎子·因循》。

⑤ 《管子·禁藏》。

⑥ 《史记·货殖列传》。

⑦ 《商君书·弱民》。

⑧ 《商君书·去强》。

在董仲舒的“君权神授”^①论中,作为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贤能之士,其人性的超然、智慧的卓越,已经是一个先验的存在,是一个无需证明其可能性、合法性的群体。这一对人性假设的细微而重要的修改,使得《礼记》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为现实的国家干预提供了政治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支撑,它意味着:(1)在逻辑上,国家统治者由于是代表“天”的旨意来管理社会,他成为一个道德完善和智力超群的决策者是可能的;(2)在现实中,存在着已经完成道德转化的圣人和没有完成、不可能完成这种转化的所谓愚民(小人),后者需要由前者来加以统治;(3)正因为统治者的道德和智慧是不容怀疑的,社会经济是可以由官府加以主导的,个人的效用不需要通过竞争获得,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也不需要依靠法律制度来维护。于是,董仲舒不仅夯实了儒家大同理想的学理基础,而且也为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正是基于大一统社会治理的需要和儒法思想的融合,西汉时期形成了官营工商业体制,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莽新朝以后,历代食货体制的兴废,多次财经改革的实施,尽管不无局部的变通,但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思想藩篱,显示出社会经济运行对经济思想方法论的路径依赖特点。

其次,对中国古代的儒家经济思想需要加以细化分析。西汉以后,由于朝廷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但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样的说法失之笼统。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主张尊重民众的切身权益,不赞成政府越界追求经济利益。但在西汉以后的多次经济变革中,主持新政的王莽、王安石等人一方面以儒学为标榜,另一方面却总是步桑弘羊盐铁官营政策的后尘,不断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暴露出儒家思想已经蜕变为法家理论的外衣。与此同时,坚持和深化先秦儒家经济理念也不乏其人,如对王安石的变法举措,苏轼的批评非常尖锐,他认为青苗法就是官府发行的高利贷,这种举措无异于“与商贾争利”,^②至于市易法则更是无视了民间经营者承担的风险,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而且官府介入效率低下,必然加重商品流通的成本,无法兑现平抑物价的承诺,最终使变法的结果和动机严重背离。^③这种对企业家冒险精神的认同和对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维护,已经带有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鲜明色彩。

最后,总体上来看,一个国家偏好和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思想方法论,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决定的,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为了在困难的自然环境中获得生存,人们只能依赖集体行动的方式,这是方法论整体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都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确保了人类的基本生存之后,方法论个人主义在促进人类发展中的独特优势逐渐显现出来,这一点,在明清时期的经济思想中已有所反映,人们认识到,能提供更多激励的民营经济和市场机制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丘濬强调,政府制定法规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民众,所以只要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利益,就不需要官府进行干预,在他看来,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土地制度设计,如限田、均田、复井田等,“终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④至于市场交换、货币流通,如果官府干预过多,势必滋生腐败,“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⑤王夫之在评论隋代均田制时指出,人人都有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利益的本能,“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⑥唐甄说,社会经济依靠丰富的资源、个人的努力和时间的延续而得到增长和满足,“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也”。^⑦戴震表示,由官府经办经济事务,其效益总是不如让民间当事人直接处理那样好。^⑧就连乾隆也承认“大概市井之事,

①《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②《苏轼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3页。

③《苏轼文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76页。

④《大学衍义补》卷一四,固邦本·制民之产。

⑤《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制国用·市采之令。

⑥《读通鉴论》卷十九,隋文帝一一。

⑦《潜书·富民》。

⑧《戴震文集》,卷十二,汪氏捐立学田碑。

当听民间自为流通”，像价格管理那样的经济事务，如果改由官府经办，虽然出发点是便民或益民，但手续繁多、效率低下，常常是不可持续，不了了之。^①

不难看出，对中西传统经济思想展开比较研究是可行的，也是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恰当的角度，以经济学方法论为参照，并不是苛求古人，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力求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通过翔实的文献资料，分析中西传统经济思想的共同点和差异性，结合其具体的历史作用，得出有益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启示。

[作者钟祥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20）。]

（责任编辑：）

①《清高宗实录》，卷三—四，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